

# 文化的考量:积极心理学当下之困与未来

孟维杰<sup>1</sup>, 张晓书<sup>2</sup>, 孟建伟<sup>3</sup>

(1. 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烟台 264025; 2. 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烟台 264025; 3.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49)

**摘要:**积极心理学正在经历着从闲庭信步到临渊而立的转向。这种转向,既凸显了主流心理学面临着来自以积极心理学为代表的新兴势力的挑战与压力,同时,也表明积极心理学自身暴露出的短板与局限,以及由此向文化寻求支持的一种诉求,更是为寻求破局而作出的努力。可以预见,积极心理学将会以脑认知革命到来为契机,不断理顺积极心理、脑和文化环境三者关系,实现对心理学范式变革的显著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积极;积极初心;失序;文化转向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0)05-0387-05

## 1 前言

不可否认,积极心理学正以一种“全新”的心理学形式和姿态,伴以鲜明的研究主旨、迥异于传统心理学的研究理念,成为新世纪以来夺人耳目的新兴力量。纵观 20 余年学术沉淀与积累,积极心理学羽翼渐丰,成功地在心理学界谋得一席之地,完美上位。如果说积极心理学当初问世时尚算意气风发,胜似闲庭信步,凭传统主流心理学反叛者和解构者的身份,极尽质疑与批判之能事,那么今天的发展则如临渊而立,不仅衍生出撕裂心理学的风险与变数,而且在缺乏与传统主流心理学对话资本和能力的语境下,二者之间对话所产生的矛盾明显大于意义。如果以“文化”为镜来加以审视,会发现积极心理学对文化的接纳与理解还有着一定的距离,人的积极品质和心理在“文化”名义下日渐式微。

## 2 积极心理学锋芒初露:来自与传统主流心理学之间关系的考察

显然,积极心理学是幸运的。如果我们假定积极心理学不是由马丁·塞里格曼(Martin M. E. P. Seligman)等知名学者提出和大力倡导,他在当时也不是 APA 的主席,很难说积极心理学运动就一定会今天的成就。当积极心理学的一些观点和这些知名学者本身所具有的某些外在社会特性与权威性相结合在一起时,积极心理学的某些主张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一定意义上的“积极话语霸权”(任俊,叶浩生,2006)。话虽如此,但积极心理学初心未改,依然对人类的积极心理保持高度关注,对人类的潜能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对人类的尊严保持强烈的学术敏感性。

### 2.1 积极心理学与传统主流心理学的“博弈”

积极心理学从刚开始将自己设定为传统主流心理学的对立面和拯救者,同时将传统主流心理学划

归到“消极”心理学阵营,按照该逻辑,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陷入到“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博弈的状态。这种对传统主流心理学“叛逆者”和“革命者”的形象尽管为自己收获了更多的追随者和拥趸,但是,也为自己的前行道路上埋下了太多的“坑”和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引起了传统主流心理学极大不满。直至今今天,发展中的积极心理学周围依然会泛起诸如具有“专制的积极态度”等不同声音和话语(Held, 2002a)。不过,塞里格曼一再强调,“从根本上而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并非是要和传统主流心理学相对立,也不是将以问题为核心的病理心理学排挤出心理学阵营。积极心理学的存在只是要实现传统主流心理学的平衡与补充,推动心理学从传统的失衡状态转向平衡状态,使心理学的价值和功能更加的完备(Seligman, 2002a)”。从其表述中,不难看出积极心理学已经收敛了锋芒,并且至少能看到其释放出与传统心理学交好的善意与诚意。积极心理学深知,面对强大的主流心理学,它需要的不是与其对立或一争短长,亦无需以“积极”来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而是获得与主流心理学对话的机会与能力。唯有审时度势和必要的妥协,彼此放下成见,才能缓解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韬光养晦也许是一种智慧选择。

须知,传统主流心理学对于人类发展而言,功不可没。其成功之处在于,以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为科学哲学基础,以实证研究方法为前提,始终坚持能用简单的法则来解释人类心理就决不用复杂法则来阐释的基本底线,努力探索人类心理现象背后的心理规律和心理机制,将科学主义原则应用到极致,不仅为自身获得了科学的名份与尊严,而且为维护、防治和治疗人类的心理疾患,推动人类不断走向完善,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技术干预。面对沉

淀和积累了上百年的传统主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既要维系自身的思想体系的独立性与创新性,同时,也要给传统主流心理学以必要尊重与认可。积极心理学批判和反思了传统主流心理学过分关注了人类的“问题”而忘记了人类还有自己的积极力量和积极品质等的局限,但这种批判和反思也只是抱怨传统主流心理学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变得失衡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积极心理学只是对传统主流心理学的一种修正,或者说是一种完善式的发展。从本质上,并没有超出传统主流心理学的范式。塞里格曼一再强调,对于积极心理学而言,以过分使用新的范式来对其进行定义,还是有些急躁。积极心理学只不过是研究视角的转换,即一种从研究生命中最不幸的事件到研究生命中最值得过的事件的转化。积极心理学并非是要替代或者取代过去的传统心理学,说成是对过去传统心理学的补充更为恰当 (Seligman, 2002b)。

## 2.2 积极心理学盛名之下

不管怎样,在以塞里格曼为首的众多的心理学家共同努力和见证下,在与传统主流心理学磕磕绊绊的关系纠葛和博弈中,积极心理学渐渐风声水起,并很快蔓延到世界各地。同时,溢出心理学边界,其触角延伸到其他的专业领域。历经 20 余年的积累,积极心理学不但未见颓势,相反,自带傲气与自信光环,在世界各地心理学领域高视阔步,俨然以一匹黑马姿态,肆意跑马圈地。盛名之下,越来越多的论著问世,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并不为过;越来越多的积极心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吸收了越来越多成员入会;举办了越来越多和规模越来越大的积极心理学学术会议或者学术研讨会、沙龙等;越来越多的积极心理学成果不断地尝试着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比如教学、咨询或者心理健康等领域。积极心理学似乎演变成成为众神狂欢。仅以我国为例。在中国知网上,以“积极心理学”为关键词,以 1998 ~ 2019 年为年限,搜索到的文献达到了 5000 余条。从百度搜索引擎中输入“积极心理学”关键词,搜索到的相关信息达到了 5780000 余条。如果放眼全世界,这个数据可能会更令人瞠目。尽管这样的数据似乎无法精准地说明积极心理学的发展态势,但是,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火热和受关注程度。在缺少对积极心理学全面考察和反思前提下,学界纷纷跟进与发声,趋之若鹜,仿佛研究积极心理学成为一种时髦的标签,这既可以称之为一种“不耻于后”的精神,如果将其视为抱有功利心的“蹭热度”亦无可。只是,热闹过后,徒留下一声叹息和一片喧嚣。

## 3 积极心理学何以失序:文化的视角

### 3.1 积极心理学犹豫与难题

积极心理学之幸在于恰逢合适的时代出现合适的人,并以合适的方式来推进和传播。同时,传统主流心理学自身的局限也为积极心理学的问世提供了可能。不过,积极心理学毕竟属于新生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伴随着争议与质疑,本身就说明了积极心理学有着授人以柄的口实。比如,对“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进行的简单近乎粗暴的划分,过分偏爱积极心理,轻视消极心理,视积极心理为人类的最重要的心理品质,甚至于稍显武断地将二战以来的传统心理学划归到类医学范畴 (Sheldon & King, 2001),致使心理学出现了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的再失衡,进而演化成为“积极话语霸权” (Held, 2002b)。尤其是,对心理过程进行积极、消极的人为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心理的整体性、复杂性 (McNulty & Inham, 2012),使人产生积极心理学要取传统主流心理学而代之的错觉;比如,积极心理学对以人为本主义心理学从开始的拒绝到后来的示好的心理纠结,这种为达目的而厚此薄彼的做法令人唏嘘,被学者批评缺乏胸襟和气度 (Resnick, Warmoth, & Serlin, 2001);比如,当积极心理学被指责缺少对传统主流心理学必要的尊重和敬畏时,积极心理学一改初问世时的傲娇,不断向传统主流心理学释放善意与认同,这让人以为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立场的善变和摇摆 (Held, 2004);比如,积极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幸福、美德、积极品质等,缺乏精准与深化,在缺少具体的文背景前提下来抽象地探讨这些命题,其意义十分有限,等等。由上观之,当下积极心理学既有犹豫,亦有难题。所犹豫者,在于积极心理学并非完美,只是看上去很美。在看似光鲜的表面背后,是积极心理学试图补充、完善和变革传统心理学现状的情怀与信心是否需要坚守的问题;所难题者,在于作为始生之物,从积极心理学本身以及其与外部心理学形态的关系的纠葛来看,它还是有着诸多需要改进和磨合的地方。将其视为是传统主流心理学的一场革命还为时尚早。

### 3.2 积极心理学文化思考

当然,抛开积极心理学的生长语境与传统主流心理学关系,求全责备于积极心理学的野蛮生长,则也有失公允。有学者指出,就其根本而言,积极心理学与传统主流心理学只是一种建设性冲突,它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即实现人类的幸福与繁荣。只是实现的方式、理念和路径不同 (翟贤亮, 葛鲁嘉, 2017)。话虽如此,但无论如何,对积极心理学的反思与追问不应止于此。如果从文化视野来进一步扩展对积极心理学的思考,则发现积极心理学深陷困局的深刻根源,这导致积极心理学追求的人类幸福

和积极品质在“文化”之镜下渐行渐远。

### 3.2.1 方法中心预设

方法中心预设是对研究方法的理解与应用。心理学方法中心主义主要体现在对实证方法的推崇,也即方法的工具主义。传统主流心理学之所以能登上科学殿堂,实证方法的运用是根本和关键(Martin & Sugarman, 2001)。科学的两大特征,一是可证实性,二是可重复性。可证实性的哲学前提是实证论。成为科学的根本条件是以实证论为指导的实证方法的运用和结果的可重复性,心理学也不例外。当年冯特以实验内省法为条件,心理学才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冯特以后的西方传统主流心理学将实证方法应用到极致,形成了实证方法优先和中心地位,导致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工具主义,尽管这可能会缩减了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但确实为心理学赢得了科学的地位与尊严。实证方法对于心理学的科学性而言,不可或缺,也是根本,这同样也影响到了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获得学界的认可的前提是对实证方法的推崇和方法为中心的预置,这是其走向更加科学化的悖论。积极心理学如果要与传统主流心理学达成对话,或者说实现与其平起平坐,实证方法中心预设是前提。正是借助主流心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方法,如调查研究法、比较法、实验法等,才实现了自身的科学性,这也是积极心理学当初执意与以现象学为指导而非以实证论为指导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摆脱干系的原因。为此,塞里格曼也表达了对传统主流心理学及其实证方法的认可与尊重。在他看来,积极心理学走向科学并不难,传统主流心理学已经为此做了卓有成效的奠基性工作,只要能将传统主流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为我所用,通过使用病理性心理科学所创造的那些操作性定义、评估方法、结构方程模型、实验方法、干预手段和结果检验等,就会实现积极心理学的进步从而取得积极心理学研究的进步(Seligman, 2003)。这是塞里格曼向传统主流心理学方法中心预设的方法论表达致敬和谢意,同时也印证了积极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工具主义痕迹。

### 3.2.2 文化意蕴抽离

文化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个类似发生学悖论。目前,学界的普遍共识是,人是文化的人,文化也是人的文化。人通过创造文化来创设特定的规范与价值,对人的心理和行为起到制约和塑造作用。因为人与文化的共生性,决定了人创造的文化 and 人的心理也同样具有交互性,可以使人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发展出特定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并使得人进行有效的社会行为和交往成为可能,这既是心理学文化品性的体现,也是心理与文化具有共

生性这一命题成立的有力注脚。文化的逃离与回归曾经是,现在依然是传统主流心理学面临着的深刻的文化之问(孟维杰, 2008)。积极心理学也面临着同样的文化追问,文化意蕴的抽离是其面临的尴尬与阵痛,这并不奇怪。积极心理学的科学性以实证方法中心预设,依据本体论和实证论,需要抽离文化背景对人的心理进行抽象的研究,以最简化的心理机制来探索和构建人的心理规律,这是积极心理学确保科学性的逻辑。那么,文化作为无关变量或者干扰变量,必须予以剔除。例如,积极心理学关于幸福的研究即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有关幸福的简单的数据对于个体而言,抛开具体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生活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意义(Wong, 2011a)。个体是否真正感到幸福,必须结合特定的文化环境、过去的经验及认知能力来评判。脱离了文化的幸福,其内在的意蕴就变得干瘪而苍白,也显得过于笼统和抽象(Nussbaum, 2008)。由是观之,缺少了文化的观照,积极心理学何以使人更加积极,这是积极心理学高水平、高层次研究呼唤文化回归的理性追问,才能凸显积极心理学更加“积极”的意义。

### 3.2.3 现代性二元对立思维

积极心理学令人称道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核心理念:积极。这场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兴盛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将对人的乐观、幸福感等积极体验与特质研究推向极致,至于这一结果带给人类及心理学学科本身潜在风险与威胁似已无暇顾及(Grant & Schwartz, 2011) - 尽管当时 Seligman, Parks 和 Steen 等人(Seligman, Parks, & Steen, 2004)曾明确提出积极心理学努力并积极推动“修复弱势”与“培养优势”的平衡发展的理念。这并不是说,提出积极心理学就能解决目前传统主流心理学面临的问题与危机。当积极心理学备受推崇和强调时,其实是走向了所谓传统主流心理学的反面:一方面,这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的表现,它所引发的问题与“消极心理学”带来的问题从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无形中会增大心理学割裂和断层的风险(Joseph & Linley, 2006),这对于心理学本身而言,是一种伤害;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和关注积极心理,轻视消极心理,这种近乎简单粗暴的对人的心理的二元划分方式,可能会导致对积极心理的盲目追求,难以全面考察积极心理的消极作用和消极心理的积极作用,破坏了人的心理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变动性(Weinstein, Marcus, & Moser, 2005)。尽管塞里格曼试图不断尝试拉近与传统主流心理学的距离,也一再表明积极心理学只是对传统主流心理学的完善与丰富(Seligman, 2002c),但是,说到底,这场运动依旧是一场现代性二元对立思维的引领和狂欢。这就

意味着以此思维方式贯穿于积极心理学研究过程,则积极心理学依旧无法突破现代性图景的桎梏。

### 3.2.4 本土化错位

这场发端于美国的积极心理学运动已经溢出了美国边界,蔓延至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后,所引发的热情与信心爆棚甚至连塞里格曼都感到意外。这造成积极心理学运动中另一个不容忽视问题:本土化错位。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不仅隐含着西方文化裹挟着西方心理学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殖民和文化渗透——尽管这一过程可能会很隐蔽,而且也表明了这些国家本土意识的苏醒和试图从过于分优势的西方心理学的主控或宰制中重新获得自发性、自主性及自动性的努力。面对这场积极心理学运动,当人们蜂拥而至,投身于其中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深入思考这种明显带有西方文化印记的心理学运动与本国文化之间是否契合的问题,或者说,这场运动能否有效地根植于本国的文化土壤之中。在看似喧嚣的背后,实则是积极心理学本土化错位的凸显。究其实质,如果心理学本土化运动遭遇来自文化上的不对等,那么,与其说是本土心理学研究,倒不如说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验证西方心理学的研究。这样的本土化研究,其实在不自觉地沦为西方心理学附庸同时,从深层次而言也是在西方心理学“扶植”名义下文化殖民的“助推者”,其研究的隐蔽性也常使人失去应有的判断力。尽管有学者努力开展积极心理学本土化的改造与创新,比如,张晓明对儒释道三家的“乐”进行解读,指出中国文化中“乐”的内涵比西方心理学中幸福感的内涵要丰富得多;曾红和郭斯萍研究中国传统的幸福观强调个体心灵的宁静和谐;王华研究西方的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体现本质上是和谐心理;孟万金也编制过关于中小学生的积极品质量表,不一而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看似风光的本土化努力和尝试毫无例外地淹没于积极心理学宏大的叙事中,能给积极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带来什么改变和影响,还是值得商榷。

## 4 积极心理学前瞻与未来

积极心理学未来道路如何行走,这是积极心理学在经过文化视野的解析和思考后需要作出的理性回答。这既是回应积极心理学何去何从的应然性和深层次追问,同时,也是从时代语境中为推动积极心理学更好前行提供思想引领。未来,积极心理学可能会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 4.1 文化神经科学探索

文化神经科学作为新近发展迅速并且成果斐然的学科,俨然已经成为了认知神经科学的代表学科之一。作为一门融合性和交叉性新兴学科,文化神经科学实现了最广阔的文化背景与最微观的脑神经

网络之间的互动和对话。那么,有理由相信,积极心理的文化神经科学探索恰逢其时。如心理学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知道了杏仁核控制着人的恐惧情绪,与杏仁核相关的缺陷被称为心理盲(Psychic Blindness),随后的研究也证实了脑岛与人的厌恶情绪相关、眶额皮质则与人的愤怒相关等。对人类的乐观、幸福、尊严等积极心理和积极品质的文化神经科学的探索,寻求人类积极心理神经机制与文化互动,这应该是积极心理学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增长点。

### 4.2 引入文化变量

积极心理学文化上的短板需要借助文化来补正。尽管有部分学者开展了将文化作为关键变量引入幸福感、道德等的跨文化研究过程,如Joshano研究了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幸福感结构,但多集中于研究幸福概念、结构等跨文化一致性或差异性而忽视其他(Joshano, 2014),这类研究尚属无文化研究或者类文化研究,这显然不利于全面探究积极心理的跨文化差异。既然人的心理与文化的共生性决定了积极心理学更应该侧重于情境的、文化的因素研究。那么,不仅考察积极或消极心理过程的跨情境、跨文化一致性与差异性,而且要注重把握情境、文化等因素对于积极或消极心理的影响作用与影响方式等,这是积极心理学实现对人的“积极”研究的前提。

### 4.3 深化本土化运动

将明显带有西方文化印痕的积极心理学引至我国,所引发的文化上的震动与冲击不亚于心理学的一场革命。如果不假思索和文化的辨别,匆忙之间对其追捧,或者即便是进行以名义上或者表面化的本土化工作,也无非是打着本土化的旗帜实则是为西方文化的渗透不自觉地推波助澜。很显然,幸福、乐观、感恩、希望、尊严、美德等这些明显具有西方文化特点的命题是否适合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须加以文化的深刻辨析或者文化改造。忽视文化差异而盲目运用,可能会加深其文化困境破解的难度。另外,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孕育着伟大的积极心理学思想,比如对集体认同、孝道、包容等。如何深入挖掘积极的思想,与外来的积极心理学思想实现文化上的对接和契合,真正的深化本土化运动,这注定是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道路。

### 4.4 更加关注应用

既然积极心理学宣称其主旨是为了探索人类的积极心理和积极品质,那么,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构建、方法运用及技术干预等,理应以能应用到人类的现实生活,并以人的外显和潜在的积极力量、积极品质等为出发点,以增强人的积极体验为主要途径,最

终培养人的积极人格。积极心理学也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才能得到检验和验证。积极心理学自身存在的一些局限、漏洞或者瑕疵等,也只有在应用中才能逐步得到完善和修正。有学者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发现积极心理学的三大支柱“积极情绪体验、积极特质和积极社会组织”并不十分适合人的现实状态,进而提出和总结出积极心理学的四大支柱:美德、意义、心理弹性及幸福感等,以取而代之,并进一步提出“积极-消极双加工模式”等(Wong, 2011b),以更加契合人类现实生活。概言久,美好生活呼唤积极心理学的现实转向,积极心理学只有在现实生活的历练才能有更加“积极”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孟维杰. (2008). 论心理学文化品性. *心理科学*, 31(1), 253 - 255.
- 任俊, 叶浩生. (2006). 当代积极心理学运动存在的几个问题. *心理科学进展*, 14(5), 787 - 794.
- 翟贤亮, 葛鲁嘉. (2017). 积极心理学的建设性冲突与视域转换. *心理科学进展*, 25(2), 290 - 297.
- Grant, A. M., & Schwartz, B. (2011).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Th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of the inverted U.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6, 61 - 76.
- Held, B. S. (2002). The tyranny of the positive attitude in America: Observation and speculatio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8, 965 - 991.
- Held, B. S. (2004). The negative sid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44, 9 - 46.
- Joseph, S., & Linley, P. A. (2006). Comment: Positive psychology versus the medical model? *American Psychologist*, 61, 332 - 333.
- Joshanloo, M. (2014). Eastern conceptualizations of happiness: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with western view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5, 475 - 493.
- Martin, J., & Sugarman, J. (2001). Modernizing, postmodernizing and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 370 - 371.
- McNulty, J. K., & Inham, F. D. (2012). The pitfalls of valenced labels and the benefits of properly calibrated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67, 576 - 577.
- Nussbaum, M. C. (2008). Who is the happy warrior? Philosophy poses questions to ppsychology.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7 (S2), 81 - 113.
- Resnick, S., Warmoth, A., & Serlin, I. A. (2001).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y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connection: Implications for psychotherapy.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41 (1), 73 - 101.
- Seligman, M. E. P. (2002). *Authentic happiness* (pp. 137, 265 - 268, 136 - 140).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Seligman, M. E. P. (2003). Foreword: The past and futur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C. L. M. Keyes & J. Haidt (Eds.), *Flourishing: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life well-lived*. Washington DC: Published by APA, 2003. xvii.
- Seligman, M. E. P., Parks, A. C., & Steen, T. (2004). A balanced psychology and a full lif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59, 1379 - 1381.
- Sheldon, K. M., & King, L. (2001). Why psychology is necessa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3), 216 - 217.
- Weinstein, N. D., Marcus, S. E., & Moser, R. P. (2005). Smokers' 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their risk. *Tobacco Control*, 14, 55 - 59.
- Wong, P. T. P. (2011). Positive psychology 2.0: Towards a balanced interactive model of the good life. *Canadian Psychology*, 52(2), 69 - 81.

##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The Predicament and Futur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Meng Weijie<sup>1</sup>, Zhang Xiaoshu<sup>2</sup>, Meng Jianwei<sup>3</sup>

(1.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of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of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3.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Positive psychology is experiencing a shift from from strolling to the edge of abyss. This shift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challenges and pressures of traditional mainstream psychology from emerging disciplines represented by positive psychology, but also indicates the shortcomings and limitation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tself, and the need to seek culture from this. An appeal for support is even more an effort. It is foreseeable that positive psychology will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the brain cognitive revolution to continuously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psychology, brain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realize a significant leading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paradigm.

**Key words:** positive; positive initial mind; disorder; cultural turning